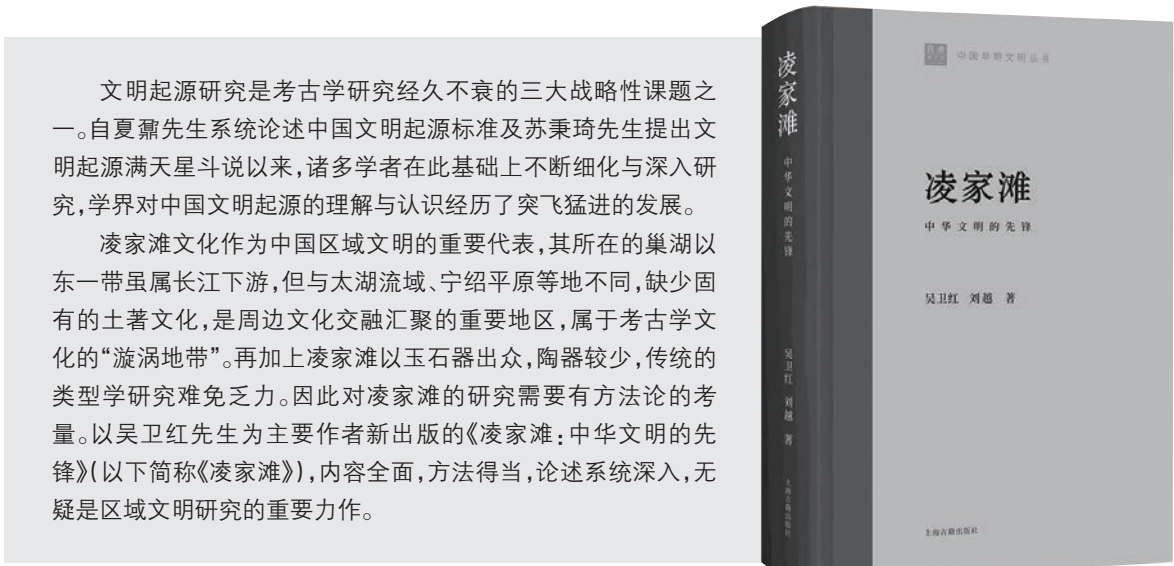


# 当代田野考古的转型

——读《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

单思伟



文明起源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经久不衰的三大战略性课题之一。自夏鼐先生系统论述中国文明起源标准及苏秉琦先生提出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以来，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细化与深入研究，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解与认识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凌家滩文化作为中国区域文明的重要代表，其所在的巢湖以东一带虽属长江下游，但与太湖流域、宁绍平原等地不同，缺少固有的土著文化，是周边文化交融汇聚的重要地区，属于考古学文化的“漩渦地带”。再加上凌家滩以玉石器出众，陶器较少，传统的类型学研究难免乏力。因此对凌家滩的研究需要有方法论的考量。以吴卫红先生为主要作者新出版的《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以下简称《凌家滩》)，内容全面，方法得当，论述系统深入，无疑是区域文明研究的重要力作。

## 篇章评介

《凌家滩》全书分为九章，分别以“一方水土”“发现溯源”“兴起江湖”“饮食器用”“玉石制作”“逝者世界”“凌家滩文化”“互动与传承”“凌家滩与中华文明”冠以标题，用诗意的语言阐释古代世界，文学性与学术性相映成趣，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章化用谚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既分析了凌家滩所在地区的地理环境面貌与变迁，又暗示了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凌家滩文化特色，为下文展开论述作出巧妙铺垫。

第二章“发现溯源”，虽大抵以常规的时间脉络介绍了凌家滩遗址三十多年来考古发现、发掘的历程，但所分三小节“偶遇文明遗珠”“追踪史前墓地”“探寻古人世界”，充满故事性，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凌家滩田野考古工作理念与方法的变化。

“偶遇文明遗珠”讲到凌家滩村民因母亲去世挖矿埋葬发现凌家滩遗址的往事，坦诚告知读者古代遗址埋藏的复杂性和发现的偶然性。“追踪史前墓地”介绍了自1987年至2007年的五次考古发掘及2016年一次意外的大墓清理过程。五次发掘基于多种原因，主要以墓地与玉器为中心，清理了一批新石器墓葬，出土大量精美的玉器。“探寻古人世界”则介绍了2008年至今的考古工作，主要包括持续多年的区域系统调查和全面勘探，及在此基础上精准发掘，一是深入探讨了凌家滩文化的分期、年代与谱系问题，二是对凌家滩文化的生业、技术、生活、环境、聚落与社会有了全面解读，展现了从以墓地、玉器为中心到以聚落与社会为中心的巨大转变，开启了凌家滩田野考古的新时代，极大地推动了凌家滩文明研究。凌家滩考古可谓是中国田野考古理念从资料主导下的“重发现”到课题引导下的“重研究”的先行者之一。

第三章“兴起江湖”，重在探讨凌家滩崛起之因，这也是凌家滩研究的难题之一。作者首先介绍了距今六千纪中国主要区域的文化态势，并重点分析了长江下游地区文化互动格局，揭示了皖江两岸作为多文化融合通道的文化背景。

其次以区域系统调查为基础，归纳出以凌家滩为中心的周边区域的聚落分布模式与演化规律，特别是凌家滩所在的裕溪河流域，经历了马家浜时期聚落数量少、面积小、呈单体分布到崧泽时期数量剧增，规模变大，呈聚群分布再到凌家滩时期数量变少，出现大型聚落中心(凌家滩)，呈集中化分布的演化过程。

然后分析了凌家滩遗址所在位置的区域条件，如附近的水源，矿产与动植物资源分布，交通要道特点等，并讨论了凌家滩聚落的布局、功能分区及相应的人际关系。

最后创造性地将区域文化变迁背景、宏观聚落模式与演化规律、中观聚落选址与环境、微观聚落形态与布局等多个层次的研究融会贯通，前后递进，相互关联，凝练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第四章“饮食器用”与第五章“玉石制作”，一方面根据动植物考古研究成果归纳了凌家滩的生业经济，一方面分析了陶器、玉、石器的种类、功能、组合及制作工艺等，完整揭示了凌家滩史前的食物生产与消费，手工业的发展及玉器反映的宗教信仰、礼仪等场景。

第六章“逝者世界”，重点讨论了凌家滩高等级人群的丧葬习俗，以对墓地、祭坛的营造与使用分析为抓手，引导出墓地的布局划分、墓与坛的关系；再进一步分析墓葬内随葬品的种类、使用与摆放规律，通过葬仪窥探社会，属于经典的史前墓葬研究范式，得出的结论也颇有见地。

第七章“凌家滩文化”与第八章“互动与传承”，属于文化历史研究层面。鉴于凌家滩文化陶器资料较少，完整度低，加上“漩渦地带”的文化内涵复杂性，使其成为凌家滩研究的另一个难题。作者突破了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多以分期指向意义更大的陶器作为单一依据的处理方式，较有建设性地提出“文化基因”的概念，辨析了凌家滩文化与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文化的差异与共性关系，回归考古学文化最初的经典定义，梳理了凌家滩文化的聚落与墓葬、不同材质的遗物的面貌，更立体地揭示了凌家滩文化的内涵。在讨论文化源流及与周边文化互动关系时，也贯彻了这一思路，多方面、多维度揭示了凌家滩文化的动态变迁过程。

第九章“凌家滩与中华文明”，将凌家滩文明置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大背景下，分析了凌家滩文化的聚落、资源控制与社会权力等问题，探讨了凌家滩社会的复杂化状况，阐释了凌家滩文明基因对中华文明的突出贡献，点出本书主旨：“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凌家滩文化，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文明先锋’。”

全书体系完整，兼收并采，不蔓不枝，高度凝练出区域文明特质，对于深化理解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 当代田野考古的转型

《凌家滩》一书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诸多对文化、文明的探讨角度对于史前考古研究都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本人学力有限，暂只论其中的田野考古理念方面。凌家滩田野考古自2008年以后率先突破了田野考古“重发现”的思想窠臼，在预设研究课题的指导下，除了开展不同空间尺度的田野调查、勘探与发掘，还特别强调资源共享，与不同学科平等合作，开展各项研究，全方位立体揭示凌家滩内涵，让全民共享考古成果，对于中国田野考古的发展与转型颇有启示作用。

在20世纪全国主要时空框架还未建立的背景下，“时间”成为当时学界首要解决的问题，田野考古基本是以纵向发掘为主导，地层学也主要强调上下叠压打破关系。这个阶段的田野考古为构建中国主要地区的文化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聚落考古的概念传入并逐渐兴起。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广泛重视遗存之间的空间联系，田野考古多采用横向发掘的理念。研究则从宏观(区域)、中观(遗址或地点)、微观(遗迹组)等不同空间尺度分析聚落形态与演化，结合多学科多维度分析，进而探讨社会组织与发展。这应该是目前中国田野考古所处的主要阶段，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有重大推进作用。

当前我国考古学科正处于剧变的阶段，一方面世界考古学不同流派、理论方法或研究范式百花齐放，丰富了考古学研究角度；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大量融入，不断拓宽、深化了考古学研究对象与内容。同时，学界对田野考古的信息诉求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田野考古工作理念与方法亟需新的转型。

**一是全面迈开从传统考古队到开放性科研平台的转型步伐。**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提出将“考古工地转变为实验室”并已有少量实践，反映了行业内部新的声音。

传统的考古队采用领队负责制，队员一般由野外作业人员(含调查、勘探、发掘、记录、摄影等)、室内整理人员(拼对、修复、绘图等)和后勤人员组成，多为技工，少量文博正式工作人员，高校考古队则多以老师、学生为主。考古队是所有田野资料的收集者与拥有者，拥有优先发表的优势。相关学科研究人员多以辅助的角色参与到部分野外信息采集和后期研究。总体来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作坊式”工作模式。这样的田野团队管理机制与当前不断发展的考古学科极为不相称，甚至阻碍了考古学科的发展。

考古队需要主动拥抱未来，进行自内而外的变革。领队或项目负责人要摒弃“封闭”思想，坚定“开放”的理念，转变自身角色，将考古项目管理更替为课题管理，将考古工地转化为开放性科研平台，形成在课题负责人统筹下，以主旨课题为指导，田野业务人员为基础，不同子课题人员彼此配合、协同研究的科研团队。

**二是贯彻以考古学课题为主导的多学科系统信息收集与综合研究。**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留下的物质遗存研究古代人类文化、社会及其历史的学科。考古学研究资料虽然包括人工遗存和自然遗存，但必须是讨论与人类文化、社会及其历史有关的课题，才算考古学研究范畴。凭借田野考古工作收集的自然遗存研究自然科学问题不能算作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转化为开放性科研平台，并非无限开放，而是有其学科边界。需要由课题负责人及相关成员共同设计若干考古学课题，组成一定开放性的研究团队，开展考古学研究。由此可避免无限开放造成的科研秩序混乱。

在考古开放性科研平台上，团队根据不同子课题的研究目标，深度参与田野考古各个环节，有规划性和预见性地系统收集各类遗存信息、平等合作，共同研究。

田野考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国田野考古虽已基本完成了从“重发现”到“重研究”的转型，走出“原始积累”阶段。但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研究的方法、手段依旧困扰着田野考古的发展。地下遗存信息浩如烟海，有限的研究角度、方法与手段依然无法提取和分析所有的信息。学界需要对学科所处发展阶段有所宽容，但更需要做出前瞻性的预见，引导田野考古学全面收集信息。

系统收集遗存信息之后的研究更是课题负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各子课题的研究内容虽各有侧重，但不建议过于分裂，应该有一个总课题的统筹和更高层次的研究导向。破解科技与考古“两张皮”的关键是摒弃以方法、技术为导向甚至目的的孤立研究，而是结合不同学科研究，融合各种相应的科技手段，综合探讨同一个考古学话题。

**三是树立更立体与更微观的课题意识，走出宏观叙事“舒适圈”。**课题研究要注意避免单一线索或单一维度论证，容易导致结论偏颇或夸大，更应忌讳预设“噱头”式结论。课题负责人需要打破学科壁垒，用科学实证的思想开展多层次、多维度的课题研究，使论证与结论更加立体可信。

再就是以往研究基于多种原因，偏向宏观叙事。这种研究倾向也主导了田野考古工作理念取向。宏观叙事研究可以很好地揭示较大空间尺度的文化历史过程和文化内涵，也能较好地讨论社会结构与发展，但对更具体的人类行为与关系缺乏足够关照，难免有失生动。

在继续深入宏观叙事研究的同时，还需要切入更微观的课题，“两条腿走路”。比如我们在襄阳凤凰咀遗址做的微观研究实践，通过对一个石家河文化灰坑的全方位信息提取和多学科综合分析，揭示了该灰坑从挖掘、使用至废弃的生命史，判断以该灰坑为中心发生过多次宴飨活动，并对宴飨的内容、食材的选取、食物加工方式、酒水的使用、活动参与者的身份与规模、活动频率都做了系统讨论，给研究者呈现出一个活化的历史场景，细化了考古学研究史前社会的视角。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

作者：吴卫红 刘越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定价：168元

# 一座土墩的生长史 和一个社会的生活史

——《镇江孙家村遗址发掘报告》读后

唐锦琼



孙家村遗址是近年来长江下游地区、长三角地区、宁镇地区商周时期考古的重大收获。最近喜得新出版的《镇江孙家村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发掘报告》)。以下仅就本人拜读《发掘报告》后的些许想法略作阐发。

孙家村遗址的发掘于2019年结束。仅仅过三年，发掘报告即正式刊布，实属神速。该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发掘成果，特别是发表了大量日常陶器，为完善和细化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和序列提供了新的资料。在我看来，这次发掘的更大意义还在于融入了中国考古学转型期的发展洪流，为我们从考古学上认识宁镇地区的两周时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曾有学者指出，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界，中国考古学由原来的建构文化谱系、描述文化过程为主的文化史研究，向人、社会、资源和环境及其相互关系为主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向转移。对于孙家村遗址所在的宁镇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来讲，多年的考古工作已然构建起了本区域的基本文化谱系和序列。如何进一步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更为全面系统地认识本区域两周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成为考古工作者必须直面的。进入新世纪以后，长江下游的商周时期考古工作开始关注以城址为代表的遗址类遗存的工作，先后在一系列城址开展工作，包括无锡阖闾城、镇江葛城、江阴余城(花山)、姜堰天目山城和苏州木渎古城等，最近还在无锡鸿山越墓附近发现吴家浜城址。这些城址的工作为它们勾勒本区域商周时期宏大的历史图景，极大地深化了对本区域文化发展历程的认识。但此类研究失之于大，缺乏对历史细部的认识和了解，需要以一处处基层聚落遗址为抓手，进行具体而微的观察。孙家村遗址的发掘恰恰补足了这一缺环。

首先，这次发掘促进了对本区域两周时期聚落形态的新认识。20世纪50年代尹焕章等先生通过在宁镇地区的调查，确认古代遗址位于高出周围地面的土台(土墩)之上，并称之为“台形遗址”。以往发掘工作都仅仅关注到土台本体的堆积情况，而对土台的具体布局探索不足。通过这次发掘，确认了孙家村遗址由中间的土台和周边的环壕两部分组成，土台边缘有土垣环绕的基本布局。以此认识为线索，考古队在周边地区展开的调查中发现多处类似布局的遗址：南墩墩遗址、东巨遗址、谢家神墩遗址台地边缘有土垣，外侧有壕沟；断山墩、藕电墩遗址和文昌阁遗址在外侧发现有壕沟；东庵前遗址的台地虽被破坏，但钻探显示周边仍有壕沟；锣鼓山遗址和乌龟墩外围有洼下的条沟，也可能是壕沟的子遗。这些表明，此类带有环壕的土台是本地基本的遗址形态。此种形态的遗址并非宁镇地区所独有，在南方的广大区域均有发现。江西抚河流域调查发现的遗址中约四分之一是“环壕类遗址”。其一处由中部台地、壕沟及外围台地构成，中部台地与壕沟有较高的高差，多为2~3米，亦有高差达5.6米者，也是被围壕所环绕的台形遗址。安徽霍邱堰台遗址处于江淮之间，外部有内外两重围壕，中间为一处高约2米的土台。太湖三板桥遗址由东、西墩以及北墩三个土墩构成，其中在北墩南侧有一段东西向壕沟，与东西两侧的自然河道相接，构成了三面闭合的环壕。此外在江汉平原早商时期也发现很多带环壕和城垣的遗址。此种带围壕的遗址可能是南方地区早期遗址的常见形态。“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如果遗址位于平地上，潮湿的环境并不适合人类生存。如果居于高处，则距水太远，生活不便。地面上的遗址通过围壕和土垣等设施将水阻隔开，并不断向中间覆土加高确保居住区域的高爽和宜居，同时也保障了日常生活用水的来源，实现了疏水和亲水的完美结合。孙家村遗址除了外圈宽约14米的围沟，还有高达2.3米的土垣围绕，各类遗迹单位均分布在土垣内，足以抵御水患。在后期的使用中，中间逐步垫土升高，最终形成高出周围地面的土台。此种形态的遗址是对本地湿润环境适应和改造的产物，是南方地区的主流遗址形态。

其次，孙家村遗址的科学发展帮助我们科学认识台形遗址的形成过程。孙家村遗址是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晚期逐步形成的高约4.5米的土台。在漫长的使用期内，不断覆土加高，可以想见有着复杂的“生长”过程。此外，遗址在各个时期内是否有布局结构的变动?聚落的布局结构及变动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组织?这是聚落考古最为关心的问题。这就需要在聚落考古的理念下，以探索土墩布局、结构及演变过程为学习目标，摆脱以往以遗物为首要关注点的学术惯性。通读《发掘报告》，明显可以感觉到发掘者已经开始有了有益的尝试，在明确的学术目的指引下，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工作，探索土墩的生长史。平面上，对土墩采取了全面发掘的方式。孙家村遗址的整体布方面积约4650平方米，除了对下部围壕的解剖外，基本将约5000平方米的墩顶完全打开，从而确保了遗址整体平面布局的认识；纵向上，通过局部清理到底，结合探沟等的发掘，既保护上部重要遗迹现象，又充分认识了土墩的基本堆积。两相结合，即使没有全部发掘土墩，也大体构建出土墩“生长史”。

发掘者依托已有的分期结果，将遗址分为七个阶段，并大体描绘出各个时期遗址的布局情况及发展演变过程。在遗址的第一阶段，仅是在平地上有零星建筑存在；到第二阶段，遗址进入了迅速发展期，外围出现围壕和土垣等防御性设施，各类遗迹单位分布在土垣内，遗址整体状况大体成形。以后的各个阶段，人类的活动中集中在土垣内，有着土台(建筑基址)、灰坑、道路、窑址、灶坑等各类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垣内遗迹也不断堆土改建，渐次升高，形成了最终的聚落格局。孙家村遗址的基本遗迹单位是有着四个柱网的小土台。聚落的基本格局是多个小土台(建筑)再围绕着中间的大土台(土台6)分布。这些土台是当时的建筑遗迹。这些建筑多数有着很强的“传承性”，表现为“建筑使用一

段时间后堆土加高，成为新的建筑，但位置基本保持不变”。对于这一现象，发掘者在遗迹编号中特意用同一编号下的A、B、C、D等来彰显此种传承：如土台44，在第三阶段的建筑编号为土台44F，第四阶段加以堆筑，编号为土台44E，第五阶段有两次堆筑，分别编号为土台44D、土台44C，第六阶段的两次堆筑分别编号为土台44B、土台44A，直至第七阶段的完全废弃。由这一编号体系使我们较为容易地把握遗址的延续使用情况，对于系统认识土墩的布局大有帮助。可以想见，如果各阶段建筑各自编号的话，势必彻底割裂开此延续性，使研究者陷于在平面图上不断查对土台位置的窘境，无从理解土墩的生长过程。

资料整理后的资料发表工作并非简单地罗列，既要充分科学完整地体现发掘成果，又不能失之烦琐，成为一本流水账。纵观《发掘报告》，基于宁镇地区两周时期的较为完善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资料整理者不再拘泥于遗存时代的划定，而是以土墩的“成长史”为主轴，按照时间轴度来串联起所有发掘资料。《发掘报告》将遗址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晚期的使用阶段分为四期七段，并根据不同的布局情况详略得当介绍土墩的形成过程。对于遗迹数量相对较少，但布局和遗迹结构形式变化较大的第一至第四阶段逐层加以介绍，为避免烦琐，将布局情况已经基本固定、遗迹结构形式变化较小的第五至第七阶段则合并介绍。此外在“遗迹列表”中详细列出各土台和其他遗迹的所处时段和层位关系，结合各阶段的“遗迹平面分布示意图”等，方便后期的梳理和研究。这些工作构建起了纸面上的土墩“生长史”。

土墩是逐步向上堆积形成的。考古发掘就是对这一过程的逆向操作，以复原土墩由低到高的“生长”形成过程。如何更好地完成这个“逆堆积”过程，需要采用更为合适的发掘方法来完成立体的发掘和复原土墩的形成过程。孙家村遗址的发掘采取的是传统的探方法，各探方同步逐层向下清理，中间留有隔梁来比对应层位关系。这一方法相对较为保守，且使整个发掘场面较为零碎，难以窥见遗址的全貌。在发表的土台平面图上，时不时中间有一道隔梁横贯，或者小半部分在隔梁下。《发掘报告》中将土墩内的层位堆积分为东西两层分别介绍，虽然“东、西部地层堆积相近”，但“细节层次略有差别”。然后仅用两个探方(T0806、T1109)的剖面来说明整体堆积状况，略显单薄。如果有一个贯穿整个土墩的大十字剖面，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土墩的生长过程。

现在土墩墓的发掘中已经普遍采用了十字隔梁法，采用类似“剥洋葱”的方法，同步清理各象限内的堆积，同步揭露同一层位下的堆积。对于较大的土墩可以采用多留几道隔梁，如“丰”形、“丰”形，来控制地层。在清理掉某一层面时，可以在留下关键柱的前提下打掉隔梁，全面了解某一层位下的布局情况。遇到较为重要或者完整的遗迹单位，可以随时打掉隔梁，确保遗迹单位的完整。这一“发掘方式在现今高精度测绘技术、三维建模技术和无人机的技术辅助下，应当是不难完成的。在发掘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堆积层次的统一划分，以整个遗址生长过程中大层面为基准来划分层次，或许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对于孙家村遗址，最为引发关注的是与铜器生产相关的遗存。但翻检报告，与铸铜流程相关的遗迹包括六座窑址和两处烧灼坑。发掘者仅是推测可能与铸铜作坊有关，但并没有提供相关依据。报告附录中关于青铜器的检测分析研究，也仅仅是对铜器、铜渣、陶渣、泥芯以及坩埚等熔铜遗物进行的检测，并未对这些遗迹在铜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加以分析。出土的铸铜相关遗物仅有29件，包括陶范、石范、鼓风机嘴和坩埚残片等。这些发现尚无法构建起完整的铸铜工艺流程，对其具体的生产工艺、流程等还是无从复原。遗址内发现的19块陶范，2块石范，可分辨出的产品仅有戈2件、剑1件，其他难以分辨器型的范腔大多扁平，当是两面合范的简单器物，未见有容器范。大港一廉壁墓群内发现的大量精美铜器，当非此遗址能够生产的，孙家村遗址如此大体量的遗址，这些铸铜遗存属实少了些，因此当非一座专门的铜器生产作坊遗址。因此，发掘者提到孙家村遗址居民从事多项生产活动，除了铸铜外，还包括农业种植、纺织和捕鱼等。多业生产或许就是本地一个小村落的基生态和生活状况。

孙家村遗址的铸铜遗存也反映了当时铜器生产技术的下沉，一般性聚落能够从较为简单的铜器生产。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手工业技术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结构等具有重要意义。譬如，一般聚落内是如何因陋就简进行铸铜活动的?具体的工艺流程是什么?有哪些遗迹是与铸铜活动相关?铸铜技术是什么时候开始下沉的?遗址内出土的铸铜阶段主要集中在上部的第五到第七阶段，在较早的第四阶段仅出土一件陶范。这或许与遗址下部发掘面积较小有关，也提示我们从更早的层位中去寻找证据。

孙家村遗址的考古工作由最先的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转向主动性发掘，但发掘者秉持着考古工作的学术自觉，通过细致的发掘和精心的整理为我们揭开了两周时期宁镇地区社会状况的一个小角，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对于此类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具有示范性意义。孙家村遗址并非孤立存在，附近有谢家神墩、南神墩、东巨、断山墩、东庵前等一批遗址，不远处也有大港一廉壁的高级墓葬群，构成一处规模宏大的遗址群。只有将孙家村遗址置于聚落群中加以考察，才能对其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镇江孙家村遗址发掘报告》

编著：镇江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浙大城市学院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定价：460元